

近代天津女学的倡建与经费筹支(1902—1927年)

陈政祥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摘要:清末民初,天津女学的倡建得力于各要素汇集,或开埠通商后的社会风气影响,或开明士绅的鼎力支持,或政府要员的加盟,或其他社会人士的襄助。经费是女学发展的重要保证,在诸多的经费来源中,有学费收入、士绅助款、政府拨款、社会捐资等诸多形式,呈现出多元化态势。经费的支出也是纷繁复杂。经费的充裕与否,对于女学的运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近代;天津女学;经费筹措;经费支出;教育史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3)04-0086-05

一、天津女学的倡建

清末民初,天津女学的发展在北方独占鳌头,这是诸多要素汇集的结果。时值清末北洋新政,行政机构、经济、军事练兵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大步伐的改革,教育也同样经历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直隶教育的改革走在了全国各省前列。在1907年的各省教育经费岁入和岁出中,直隶分别达362万两和300万两白银,据全国第一;就学生人数而言,直隶达25万人,居全国第二^{[1]148-150}。天津乃直隶重镇,北洋新政首在直隶,直隶新政首在天津。自开埠以来尤其进入20世纪后,天津独特的经济地位,加之作为北京门户与各国驻屯军所在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尤其是外国教会在津创办的教会学校(1902年之前天津主要有Tunghsien之路河中学、第一淑真女子学校、Naval Medical College、成美中学校、仰山女学校、法汉学校、新书学院等教会学校^{[1]185-186}),极大冲击了当时旧的教育制度,开启了新式教育的风气,女子教育的开展更是受惠于此,终使天津的女子教育成为直隶甚至中国北方教育改革的典范。

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八国联军的入侵,天津的诸多书院、私塾遭到毁灭性破坏,这就为新式教育的创办提供了有利契机。1902年袁世凯从都统衙门手中接管天津城,地方局势获得了相对稳定,这为天津新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开明士绅严修于1902年7月到翌年9月“东渡瀛山”(1904年第二次东游)考察日本教育,包括幼稚园、女校、高师、专门学校在内的各类学校的规制、设备及课程编制等,还访问了近卫文爵、大隈伯爵、嘉纳治五郎等教育家^{[2]16,26,47-48,56,70,75-78,80-112,121-123},归国后在自家宅院中创办严氏女塾,就形式而言虽有浓厚的传统私塾意味,但就教学模式、男女师生混合以及外籍教师的聘任等^{[3]47-48}而言,却成为天津地区国人倡办女子学校的滥觞,如聘请“日本人川本教日语、音乐,山口教手工艺,野崎教织布,从纺纱到织斜纹、直纹布,也织毛巾”,另设算术、缝纫等课程,同时严修亲撰《放足歌》,让女生习唱,推行放足^{[4]14}。这在当时报纸舆论曾将之定性为“女学振兴之起点”^[5]。之后,天津女学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据当时调查,到1906年,天津共有各类女学15所,学生670人;次年,增至807人;至1909年,女学20所,女学生约1100名^[6]。据粗略统计,至1911年,天津各类女学达到24所,从办学层次上看,有初、高等之别,甚至有幼儿园;从性质上看,既有官立,也有民办;从类别上看,既包括普通学校,也有师范、医学等专门学校^{[7]53-54}。

当时开明士绅的兴学积极性空前高涨,严修、林墨青就是典范。他们的积极倡导,为天津女学的发轫开启了道路。严修在创办严氏女塾后,于1905年改建含初小、高小两级的严氏女学,同年又设保姆讲习所和蒙养院。1904年

收稿日期:2013-04-10

作者简介:陈政祥(1987-),男,山东日照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建天津公立女学堂，次年设高等女学堂和官立女子小学堂。绅士林墨青在天津创建十余所女子小学堂，并亲自担任校董一职，对于林墨青的办学业绩有人用“学校林立”^[106]这一双关语来颂扬。

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为代表的政府要员之倡导以及模范带头作用，为教育的兴起奠定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严修曾赋诗赞颂袁世凯在天津的兴学：“项城少保扶天轮，大兴簧舍津海滨。”^[91106]外国也对袁世凯大加褒扬：“假如没有天津归还以后的总督袁世凯那样的以非常的热心图谋教育事业的振兴的话，不仅新教育的勃兴不可能，就是原有的各学堂的重建也是不可能实现的。”^{[10]219-220}在袁氏的直接主导和积极推动下，建立了北洋女子公学、公立初等女学堂、北洋高等女学堂、北洋女医学堂、天津县官立第一女子小学堂等一大批女学堂。其中，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就是袁世凯直接委托办学经验颇丰的直隶提学使傅增湘创办起来的。为了消除阻力，力革女子教育，袁世凯在考察上古三代及东西列国的教育制度后，以“国家之盛衰，多本于女子之贤否”来说明北洋女师的合法性。傅增湘等人也积极借助天津的区位优势及《大公报》等舆论媒体进行招生宣传^[11]。

二、女学经费的筹措

女学作为一项近代教育界的拓荒事业，其发展的首要因素即是经费。经费是否充裕成为女学能否充分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史料的挖掘情况而言，经费的来源呈现多元化态势。

1. 学杂费收入

学杂费包括学费、住宿费、书本费以及其他各项杂费。学费在经费的各项来源中，虽然比例不是最高的，但是从长远来说，这是一项最稳定的来源渠道之一。

虽然学校的类型和层次不尽划一，但对学费的收缴多作出明确说明。如北洋高等女学堂和天津公立女学堂每月学费为：学习英文的为3元，其他为1元和2元^{[10]229}。圣功女学校招生时，“来本校填注报名册后，缴报名费一元。被取者坐为学金，未取者还，而被取者不入校不还”，每年招高等一、二年级插班生及师范预科等不同层次的学生共计70名，可收报名费70元^[12]。诸多学校的招生报名费为1元，如启秀女子中学，在20世纪20年代末，圣功女校的“学费收入高中2400元，小学2220元”^[13]。我们即可看出，这是一笔不菲的款项。中西女学校在《益世报》上登招生广告时就作出明确说明，“学费：春秋两季各十五元；膳费（包括住宿费）每月2.5元”^[14]，这样一年下来，每生可计费用55元。杨柳青振华女子学塾“学费：每岁六元，分三季缴纳”，每生可计18元^[15]。北洋女子公学“学费：师范科每月三元、本科二元、预科一元五角、愿学习英文者另加五角、小学科一元。膳费：三餐寄宿每月四元、只一餐者每月二元”^{[16]76}。天津贞淑两等女学校在招插班生时明确，学费国民班6元，高等班8元^[17]。贞淑两等女学校在增设师范班招生时，规定学费为“每月二元，分三季缴纳”^[18]。女子钢琴传习所“学费：来所学者每点钟半元；请教员至家授课者每点钟一元”^[19]。如果学校经费实在拮据，上级主管部门会要求学生多缴纳一些学费，如在1915年底，劝学所要求天津各学校增加学生学费：各校原先高等班学费每年4元，初等班学费2元，自第二年正月实行新学费制度将分别增加2元，以用来补学费之不足^[20]。总体说来，学费是一项稳定来源，虽然里面也存在金额不固定、多少不统一等诸多变量。

2. 开明士绅捐款助学

天津女学的兴起与当时开明士绅的积极倡导是密不可分的。正是他们资金的注入为女学的开办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甚至一些学校的经费绝大部分是士绅资金的承担。如严氏保姆讲习所“每月学费二元。经费约三千元，全部由严家负担”^{[10]230}，这些经费是由严家账房代管^{[3]46}。士绅资金成为学校开办的砥柱，如天津公立女学堂成立之时，“袁督（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故名）许拨款千元为学堂开办费；唐道（唐绍仪时任天津海关道，故名）允每月由筹款局提百金作经费”^{[21]856}。南开女中也得到过极大帮助，在新校舍建筑之初，张仲平表示同情，“允捐建筑费一万元”^{[22]149}。

女学在近代天津开办的热潮刺激了更多的天津士绅捐款于女学，这也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与鼓励，政府在核实后，多进行褒奖。如直隶提学使卢靖“遵其故父遗言减缩丧葬之资”，为天津十处女子小学校捐白银1200元，以此作为购书经费^[23]。天津知事姒继先对此事，上请巡按使进行核奖。天津公立普通女学校校长冯雅廷“捐洋1317元，修筑学校”，天津县知事据情呈报省长查核给予金色三等奖章，以资鼓励^[24]。或是当时媒体进行渲染，将事迹登之于报，如邑绅杜克臣遵循母亲的遗愿，将节省的1000元丧葬费用于公益事业，其中将200元捐助女子家庭传习所^[25]。

士绅助学款更是得到女校的热烈回应，甚至于要求士绅再助一臂之力。1926年10月20日南开女中校长张伯

苓在致长芦盐运使言敦源信中肯定他资助南开女中之功：“今日在校之女学生，皆受先生之厦庇亦无不可”（在南开女中开办之时，言仲远曾捐款 1 000 元^[31]），而“惟是春风发萌不限于一拂，雨露生物有赖乎频滋”，进而恳乞“愿先生对敝女校始终成全之。此校虽工竣，尚亏款三万余元未有着落，谨以捐启奉上，乞大力代为登高一呼”^[26]。

3. 女校请款及政府拨款

对于女学的发展，政府采取了鼓励提倡的政策，除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鼓励和保障女学兴办外，很重要的举措便是在经费上的支持。对于政府拨款一般按照这样的程序进行：女校根据自身情况，向劝学所申报，待巡按公署上级进行核查后，再由财政厅下拨，其具体表现为“天津劝学所昨禀请天津县公署拟请提拨三年，分男女各小学余款，组织河东国民学校，以谋教育之普及等情。昨经县长已转详巡按公署核办云”^[27]。如天津十处女学校校长董林兆翰因官立第七女子小学校“齐舍不敷应用”赴县署请款 2 000 元准备在辛庄地建筑合宜齐舍，认为此乃“一劳永逸之计”^[28]。约半年之后，财政厅同意之前第七女子学校请齐舍之款要求，下拨 3 520 元^[29]。同样，其他一些学校也是走相似的程序，如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拟扩充预科班、中学班、附小男女合班等班次，请求财政厅拨经费^[30]。

有时候学校校长则直接与政府商谈，如在 1926 年 11 月 25 日张伯苓致财政总长潘馨航信说“每月应由盐余拨给之公债息款六千五百元”^{[26][94]}。

政府不仅仅是拨给资金，还有一些是其他形式的资助，如“巡按使公署科、内务科、教育科、实业科等昨发给男女露天学校及贫民半日学校，退笔 293 枝、废稿纸 200 余张，以资备用，亦兴学之一助也”^[31]。

除对普通女校进行投资外，政府对一些专门学校也注入大量款项，如对长芦女医学堂的资金支持。这是由袁世凯创办北洋女医院的附设学校，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办护士学校。其经费由海关按月拨给 700 元，不足款项由医院诊费收入和官商捐助做补充。1908 年天津海关拨银 2 万两。1916 年天津海关停付该院经费，则由严修、张伯苓等人接办，芦钢公所每月拨给经费。20 世纪 20 年代时，则收学生学膳费洋 30 元^[32]。

4. 社会捐资兴学

除政府、士绅热心兴学外，由于受到天津地区开埠以来的开放风气的洗礼，社会人士也认识到兴学对自身颇有裨益，也纷纷捐资兴女学。根据 1916 年天津《益世报》刊登竞存女学校捐款兴学名单的启事^[33]我们略窥一二：此次共有 30 人参与捐资，其中七成是男士，女子占三成；既有家庭妇女，也有林墨青、邓澄波之类的教育人士；捐款者系自愿捐资，捐款从 1 元至 24 元不等，既有捐大洋的，也有捐小洋的；既有捐一次的，也有捐多次的（达 4 次之多）；此次捐款计大洋 187 元、小洋 100 元。

政府对于社会捐资兴学者给予褒奖，如直隶总督袁世凯曾于 1905 年上书请奖绅士附贡林兆翰、廪膳生卞禹昌，因“襄办学务始终勤奋”分别授内阁中书衔和国子监学正衔，而“以昭激励”。

在清朝最后的几年中，关于天津女学（此处未包括静海县）经费的各项筹措中，在 1911 年直隶学务公所编制的宣统二年的《直隶教育统计图表》中，有过较为翔实的记载。

5. 其他方式的筹款

由于天津遭受庚子之乱，天津女学在兴办之初，很多女学是借助于庙宇兴办起的，如东门内弥勒庵（天津县官立第二女子小学堂校址）、西门内准提庵（天津县官立第三女子小学堂校址）、水梯子白衣庵（天津县官立第四女子小学堂校址）、太平街白寺（天津县官立第五女子小学堂校址）、西北隅黄姑庵（天津县官立第六女子小学堂校址）、谢公祠（女学校一区）等，故有“废庙兴学”之说。所需学款“除由士绅筹集，主要以各庙的地租和公地租的收入为大宗”^[34]。这种以庙宇经济充当女学经费，在当时自然受到以僧尼道人为代表社会旧势力的嫉恨和攻击，这也是当时女学兴起的一个阻碍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风气的开化，这种阻碍因素渐绝于世。

三、女学经费的支出

1. 经费支出多元化

经费的筹措是多元的，同样经费的支出，也是纷繁多孔的。在 1911 年天津女学堂岁出经费（单位：两）^{[34][282]}：旧□（原文献字迹模糊，难以辨认）：2 031；职员教育及司事：9 069；丁役雇夫：1 619；操装伙食油炭等：691；租息粮税邮电等：341；实验实习教授用品：96；图书标本理化器械：144；营建修缮及设置：544；器具文具报纸等：435；分拨他学堂：空；杂项费用：1 023；特别费用：129；计：16 123。这些均是维持女校运转的基本支出。如果学校要扩大规模、增设班级、扩招学生，经费亦扩大，如天津私立圣功女校“每年现在额支数目顺费：12 664 元；暑假后新添班次

顺费:4 140元”^[13]。

学校在创建之初,支出款项更是巨大:北洋高等女学堂“校舍的新筑费用,达一万四千两”^{[10]229}。南开女中在建校之初,校长张伯苓在致周作民信中说“所最感困难者,尤莫过女中学新校舍工程清理账目(该工程费用共计五万余元)之事。该项工程结至目下,除就已募之款尽数开销外,余尚亏欠三万元未有着落,焦灼万分”^{[20]190}。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款项支出,如学校初建时期教员外出参观产生的费用也计算入内,如直隶女学校校长协同小学校教员王镇江分赴京津各女学校参观,将参观所产生的“川资房饭等费”计入校款^[34]。

2. 经费支出因校而异

女校有不同类型,其支出也有较大不同。如师范性质的女校,学费是不需要学生自行缴纳,相反,学费是学校的一大笔支出,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经费由总督负担。学生的学费,按照各自的学习的能力由本学堂给予。最优秀者,定为每人每月十元,顺次等差”^{[10]225}。在一些优质的学校,还会设立奖学金,例如南开的“范孙奖学金”等,这些都是款项很大的支出。

总教习金韵梅在致长芦盐运使张镇芳禀文中提及道,北洋女医学堂在1910年时经费:“每月应领经费七百四十七两五钱,自本年六月分因加给文案津贴银十两、书记津贴银五两……故六月分学堂经费较前多二十九两,共领银七百七十六两五钱。……本年学堂养病院应行购办书籍、仪器、药料、器械等项,每年额支银一千五百两”^[35]。1912年之时,则“十月分经费银八百七十六两五钱,宣统三年额支煤炭银四百两,女医学堂养病院添置书籍、药料、家俱等项额支银一千五百两”^[35]。另聘一员教习“月薪一百五十两,每年共需款一千八百两”,学生伙食银每人每月四两、学生每人每月津贴零费银一两、毕业生奖赏银等支出的款项处处可见^[35]。

女校层次的不同,决定其经费的多寡^{[10]229-230}:官立女子小学堂“一个学堂的经费为每月七十两”;天津公立女学堂“每月经费三百两”;北洋高等女学堂“每月经费七百两”。初等、中等、高等各个不同层次的女校,经费相差甚大,小学堂和高等学堂有十倍之差。

四、结语

经费充裕与否,直接关乎女学的存亡命运,尤其是私立女学。如温世霖初创于1905年的普育女学校,初始是女子家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因学生增多,迁校舍于鼓楼东沈宅东院,所有开办一切费用,均有温校长独自担任,学生已增至五十人,当时蒙士绅等赞助一切,校中始粗具规模……是年夏以来,学者踊跃,复迁校址板桥胡同火神庙内,经温校长奔走各处,劝募捐款,七盖校舍,扩充班次……近年因经费不足,仅存高小初小蒙养职中各科,将来经费有着,再谋恢复”^{[36]88-89}。在女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常由于经费缘故而发生变迁,开创之时,规模甚微;待创办者划出家产及四处募捐,经费稍微充裕时,学生亦随之增多,校舍也扩建搬迁,也添置一些科目;待经费捉襟见肘时,便不得不缩减规模,再图教业。如果经费收支悬殊过大,则会让女校很难顺利发展下去,只会缩减规模甚至走向倒闭之路。

纵观近代天津地区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脉络,可知办学经费对女校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成为瓶颈性因素。经费筹措的渠道非一条,而是呈现多元化态势,或政府主导,或士绅主持捐资,或其他社会人士热心兴学,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使得女子学校教育在天津从无到有发展起来,而且一定程度上引领着中国近代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苏云峰. 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2] 严修. 严修东游日记[M]. 武安隆,刘玉敏,点注.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 [3] 严仁清. 祖父严修在天津创办幼儿教育的回忆[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 [4] 齐植璐. 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 [5] 中外近事·本埠·女学起点[N]. 大公报,1903-04-14.
- [6] 秦方. 晚清女学的视觉呈现——以天津画报为中心的考察[J]. 近代史研究,2013(1):108-121.
- [7]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 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册[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 [8]刘炎臣. 一生热心兴学的林墨青[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
- [9]王芸生. 严修与学制改革[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总第八十七辑.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 [10]清国驻屯军司令部. 天津志[M]. 东京:博文馆印刷所, 1909.
- [11]李净昉. 辛亥革命时期女学生的历史选择[J]. 南开学报: 中学社会科学版, 2011(6): 21-22.
- [12]天津圣功女学校招生广告[N]. 益世报, 1917-06-27.
- [13]天津市私立圣功女子中学校校董会用表册[B]. 天津:天津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401206800-J0110-1-000008-001.
- [14]中西女学校招生[N]. 益世报, 1916-01-10.
- [15]振华女塾招生条例[N]. 益世报, 1916-02-08.
- [16]戴建兵. 吕碧城文选集[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
- [17]天津贞淑两等女学校续招插班生广告[N]. 益世报, 1916-12-18.
- [18]贞淑两等女学校增设师范班招生广告[N]. 益世报, 1917-08-01.
- [19]女子钢琴传习所招生广告[N]. 益世报, 1917-04-07.
- [20]劝学所通知各学校增加学费[N]. 益世报, 1915-12-24.
- [21]方 豪. 英敏之先生日记遗稿[M]//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66.
- [22]崔国良. 张伯苓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 [23]请奖捐款助学[N]. 益世报, 1915-10-18.
- [24]女学校长捐资蒙奖[N]. 益世报, 1917-08-23.
- [25]撙节丧费移助善举[N]. 益世报, 1915-12-14.
- [26]梁吉生, 杨珣辑. 张伯苓先生函稿[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 [27]请拨余款组织学校[N]. 益世报, 1916-02-17.
- [28]请款扩充女学[N]. 益世报, 1915-12-03.
- [29]饬领女校建筑经费[N]. 益世报, 1916-06-13.
- [30]女子师范请加经费[N]. 益世报, 1916-05-18.
- [31]捐助学校用品[N]. 益世报, 1916-02-15.
- [32]张绍祖. 长芦盐商对天津教育之贡献[J]. 盐业史研究, 2012(3): 65-66.
- [33]热心捐助女学经费[N]. 益世报, 1916-02-22.
- [34]巡按署批准参观女学[N]. 益世报. 1915-12-03.
- [35]哈恩忠. 清末金韵梅任教北洋女医学堂史料[J]. 历史档案, 1999(4): 63-77.
- [36]黄成助. 天津志略[M].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69.

The Initiative, Funding and Expenditure of Female Schools in Modern Tianjin (1902-1927)

Chen Zhengxia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Later Qing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Republica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Schools in Modern Tianjin occupied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northern China. Its initiative owed to the collection of the various elements. The affection of social tendency after Tianjin became a Treaty Port in 1860, the full support of the enlightened gentry, the attendance of important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help of others. Its diversified sources of funds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Schools. There are many forms of funds such as tuition revenue, gentry donations, governmental appropriation, social donations and others. The expenditure is complicated, too. Adequacy of funding played a crucial role for the functioning of Female Schools.

Key words: modern; female schools; funding; expenditure; history of education

(责任编辑 张春生)